

《儒林外史》与《围城》的讽刺艺术研究

王 强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小说,在文章中占很大比重的是讽刺。这部小说从社会的角度、伦理纲常、世态的角度来批判了那个时代作为文化人的人格特点。《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作品当中最具趣味、最用心叙述的一部小说,一部宏伟的小说。小说是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对社会和文明进行广泛的批评,也是对现代文化人的弱点进行讽刺;两篇小说可以说是中国讽刺小说的奇文巨著。

关键词:儒林外史;围城;讽刺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2X(2018)04-0060-04

一部伟大的巨作是要超越时空,跨越星海的,因为这是文学界的瑰宝。而吴敬梓和钱钟书的《儒林外史》与《围城》便是中国文学史上古今的两部伟大的著作,可以这样说,这两部作品在讽刺艺术上达到了一个巅峰。《儒林外史》可以说是中国所有小说中卓绝群伦的宏篇巨作之一,是真正意义上仅有一部讽刺小说。鲁迅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进行了评价,现在品味,依然最准确,说《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这就是在说作者可以秉持公心,准确把握分寸,对出现的不同人物进行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讽刺。鲁迅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概括了《儒林外史》的讽刺特征。《围城》是表现为对现实的反映,钱钟书说过:“理想不仅是个引诱,而且是个讽刺。”从这个层面上说,《围城》写的是现实对于理想的讽刺。同时,《围城》是在对《儒林外史》的继承和发展,可谓是一部“新《儒林外史》”。夏志清这样评《围城》:“《围城》尤其是比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任何一篇都优秀,可以肯定的说,它是未来世代的读者最受喜爱的作品。”^{[1]380-385}因此,两部作品的讽刺艺术,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深入研究。

1 儒学与西学的知识分子

吴敬梓笔下的《儒林外史》写的是三百年前,所写的故事和人物是儒林社会中万千世相,而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写的时代是半个世纪前,所描写的对象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众生百态,虽然两位作者所描写的时代、环境、人物都大不相同,可是两部著作中,作者笔下都有着同样令人可恨可叹又可悲的儒林。两位作者的讽刺对象都指向了“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的阶层,而这样的指向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思想中,而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处地位、所含修养、所学学识等因素的影响,这便决定了他们的性格特点,他们不甘心臣服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想要凭借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这些人看来,唯一的资本只有知识,如果有一朝凭这点资本取得功名利禄,他们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是他们的最终方向,一旦能达成这个人生的目标,不管是惨淡经营还是投机取巧均无不可。例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周进、王惠、汤知县、权勿用与杜慎卿等,《围城》中的方鸿渐、高松年、李梅亭、董斜川、褚慎

收稿日期:2018-07-18

作者简介:王 强(1992-),男,四川都江堰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教学。

明等。正因为社会的世态炎凉、扭曲,造成了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丑态,所以“儒林”一直以来都是古今文人所讽刺的对象。从三百年前的《儒林外史》再到半个世纪前的《围城》,虽然这两部作品跨越了一个半世纪,但是作品中那些面目相异而性格相似的儒林知识分子,却始终鲜活地存在于人生的大舞台上,他们出演着那种病态的人生闹剧。

但是,两部作品对知识分子的刻画也有不同之处。比如,正面人物在《儒林外史》中,像杜少卿、鲍文卿等这一类形象,在肯定中略显微词;而《围城》小说中,这种类型的正面人物,我们是看不到的。可以说,钱钟书对《围城》中人物、生活、社会都持有彻底的否定态度,特别是对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所存在着崇洋媚外的症状的嘲讽,全书里基本上都是被否定的人物。

2 人物冷讽与作者热嘲

鲁迅曾说:“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2]279}《儒林外史》之所以能称为讽刺小说,恰是因为它极具形象,富有民族特色地折射出中国十八世纪那个时期,具有浓郁的、富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实。吴敬梓在作品当中对人物的讽刺,不是一味的用自己的观点或看法去斥责,而是在此基础上利用书中正面人物的言谈举止来表现出讽刺。吴敬梓在描写杜慎卿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在第二十九回中这样写“杜公孙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手摇诗扇,脚踏丝履”、“面如傅粉,眼若点漆”,^{[3]197} 写完之后,紧接着说“这人是子键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作者先对杜慎卿进行一番类似称赞的话,而在紧接的下文又写他站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徘徊大半日”。^{[3]200} 这样活生生的刻画了顾影自怜的形象。从前文的赞美之语到顾影自怜,这是作者对人物的冷峻的嘲讽。还有在黄老爹“不做戏子”后,便穿戴起士绅的服饰,这就引起像鲍文卿这类恪守长幼尊卑的封建秩序表示不满,于是嘲讽他说:“象老爹拄着拐杖,缓步细摇,照我看来,这‘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样的冷讽到了作者的嘴边,则是直接斥责黄老爹是“老畜生!”在官员王惠到南昌任太守起初,他便等不及地要多方搜刮钱财,而蘧景玉却慢慢地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

声都要被戛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给替代。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作者通过正面的人物语言来婉转地嘲讽那些否定的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作者却是直接用自己的身份进行猛烈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把满腔的愤怒一泻而下。总的来讲,文章中的冷嘲热讽,相互和谐成趣,有嬉笑,有怒骂,这些都是妙文所成之处。

《围城》内容安排绵密,文章中的嘲讽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可以从:

苏小姐道:“我也是个普通留学生,就不知道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董先生讲点给我们听听。”

“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羲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说时,翘着左手大拇指。鸿渐懦怯地问道:“不能添个坡么?”

“苏东坡,他差一点。”

鸿渐咋舌不下,料想东坡的诗还不入他的法眼,这人做的诗肯定不知怎样的好法,便问他要刚才写的诗来看。

该部分对董斜川高谈论阔之扬言,用“陵谷山原”来概述唐代以后的诗人,而且眼中还没有苏轼。

还有就是在文中对陆子潇的外貌描写,说他头发又油又光,生怕就被帽子遮盖似的,帽子与头发的不共戴天;而鼻子短而阔,若是被别人给一拳,鼻子就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这里把陆子潇的外貌、五官作为取笑的对象。

3 以“喜剧形式”揭示社会根源

《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的讽刺小说,作于十八世纪上半时期,在书中,吴敬梓刻画了很多人物,并且在这些人物的很多的人物都具有喜剧性质,作者把这些人物身上的喜剧性色彩发挥至极致,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刻画了他们所生活时代中所呈现的一些变态的心灵。吴敬梓有着开阔的历史视角,以社会观察者犀利的眼光来看社会百态,所以说,作为他笔下的讽刺人物,他们的喜剧行为背后差不多均隐含着内在的悲剧性,也就是说,吴敬梓通过透视喜剧形象这一面来直接逼视,并且把悲剧性的社会根源表现的淋漓尽致。

周进与范进两人均是在取士路途上上演着一个悲剧小角色。周进参加考试几十年,就连最低的一个功名也不能混到,所以感到无望,甚至绝望;而范进是考了几十年的科举没有成功,可当中举的事实摆在眼前,却乐得个疯狂失发疯。这两个人物的出现,不是说两人天生就有这种变态的心理,而是两人所处时代,由功名利禄把他们骗到了科举考试的路上,弄得他们痴狂,迷得不知所以然,最后只能走向堕落。比如,周进在书中一露面,就把当时社会的环境描摹的很详尽,在这样一个世风日下,充满恶俗的社会环境中,这个已考到长满花白胡子,且还把每年用来束修馆的12两银子都给弄丢。在这样的描述中,深刻、细致地揭示出周进积聚在内心的辛酸、屈辱以及绝望的情感。所以文章中说周进进了贡院,走到天字号前,“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上号板,直僵僵昏迷不醒”。

关于范进中举后发疯,是因为他时时刻刻都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又从未料想到有这么一天,而且真的到来,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使他长久以来盼望的心中郁结终于打开,但是他的神经却不能好好的承受。在知道自己中举,便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昏迷不醒。他那整个发疯的状态、过程,都使人发笑,并且又让人觉得惨然,令人怜悯,可又让人觉得又是好笑,最后又是深深的悲愤。读者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心理过程,是对周进与范进这样人物悲喜剧所呈现出的一个艺术感受过程。由于作者对可笑之处注入了辛酸,对滑稽之处注入哀愁与痛苦,所以这样更能俘获人的兴致,从而发人深思,这样的一个喜剧,所呈现的悲剧因素,它具有深厚的社会批判性质。

所以说,《儒林外史》这部讽刺小说既包含了喜剧性,又包含了悲剧性,正如鲁迅这样说过:“悲剧是把人生中有价值的内容毁灭给人看,喜剧则是把人生中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围城》这部作品充满了虐浪嬉笑的喜剧形式,《围城》的喜剧主要围绕“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的一个矛盾心理进行叙述。作品围绕方鸿渐的人生经历来叙述的,通过对方鸿渐的喜剧性来揭示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困境。比如,方鸿渐回国后,先在岳父的点金银行做事,这是

“进城”,在他打算把心灵的创伤埋在心里,因而想方设法回避好奇心难以满足的周太太;她那随之而来的愤怒的受挫失意使得两家最终决裂,只好“出城”。不过,使方鸿渐最为惊讶的是,在这一连串的破裂之前,他得到了湖南农村一所新办的国立大学的教授职位。于是,当上海的一切都已将他排除在外的時候,他决定接受这个教职,这是“进城”。在去三闾大学任教后,发现这里充满了不学无术、贪慕虚荣,而自己又没有收到新的聘书,于是只得“出城”。所以,鲁迅曾经定下一个这样的基调:“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4]193}

4 幽默诙谐的语言

语言是文学的物质材料^{[5]399},从古至今的许多带有讽刺性的讽刺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的讽刺效果均会有“语言”这一手段。在讽刺文学作品中,有的表达出的效果是来自所描写的人物、情节、环境等的讽刺性,有的则是通过语言自身所带有的讽刺意味。其中,两种手段经常会交叉使用。《儒林外史》和《围城》都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有关讽刺文学的佳作,其中,两位作者所运用的语言描写本身就带着强烈的讽刺意味,这样的语言表达及效果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叙述中一窥端倪:

4.1 相同之处见讽刺

首先,语言环境与语言意思的不统一。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什么场合该说什么样的话,是一个人在表达时的正常表现,若在作品中出现了语言环境与语言意思不统一,那么便是带着某种讽刺意味。如《儒林外史》中范进考中秀才后,其丈人胡屠户本应向范进道喜的,可是他所说的贺喜之语在出口时却是违反常情的谩骂;王仁、王德兄弟俩准备贪图妹丈的银钱时,用神圣而悲壮的腔调来鼓吹这件无情无义无廉耻的买卖等。《围城》之中,方鸿渐留学返乡之后应允吕校长做一个演讲,所演讲的内容本应该是有关“西洋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以及检讨”的,但是他却在演讲过程中因忘带稿子,而说了前晚看到的“梅毒”、“鸦片”等。这些语言都产生了不统一的讽刺意味。

其次是前后语句之间形式对照的讽刺。不同的人在同一场景下说同样的话,颠倒了说话人、说话语序等,在这些语言形式的对照中也含有讽刺意

味。《儒林外史》中范进在考中秀才和考中举人后,其丈人胡屠户的两次贺喜时,作者的语言描写中都有“千恩万谢”,但是被谢的人和致谢的人相互调换了位置,但语句之间的形式工整且对仗;南昌府前后两任太守上任时衙门里的三样声息,余敷、余殷两个风水先生在鉴别坟土时的语言和动作等。而在《围城》中,文中在描写李梅亭与寡妇的仆人阿福的争吵情境时所用的“猪猡骂我”“我骂猪猡”的语言表达时,颠倒了语序。这些语言形式在对照中都含有讽刺意味。

两部作品中,还运用反语进行讽刺。反语是语言表达中表讽刺时最常用的语言,这样的反语所透射出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如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写到范进丈人胡屠户的地位低下时,不称其为“屠户”,改称其为“老爹”;第七回中写范进不知道苏轼,“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其实“不晓得”的是常识;夏总甲说的“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等。《围城》中船上打牌的人在见到鲍小姐后,因她的穿着和行为将她比作“熟食铺子”和“真理”等。这些语言对话中都带着反语的讽刺意味。作品中还运用夸张进行讽刺。夸大事实、现象,使得实事有种超脱现实的不实际,使得要讽刺的对象显得滑稽、可笑。

《儒林外史》里面,王太太为展现自身的尊贵,说“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拖挂”;乡绅士豪汤六老爷在妓院里逼着妓女唱曲时将自己的脸夸张为舒卷自如的帘子等。而《围城》里面,钱钟书说“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随身带着的宿舍……”,这里,作者用夸张的修辞生动形象地来表现上海住房拥挤的本质特征。这些夸张式的语言描写中都带有讽刺意味。

4.2 不同之处见讽刺

首先,典故中蕴含的讽刺意味。文人典故的使用,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幽默感与讽刺性,还体现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色彩。《围城》中灵活运用了许多中西方文化中的典故,涉及多方面的学科,如文学、哲学、心理、生物等,如方鸿渐在购买博士文凭时,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话、孔子、孟子等来为自己的无耻行径做心理暗示式的安慰;用法国作品《列那狐》中的“驴”、“萝卜”等来道出上司高松年与下属方鸿渐之间的关系等。

其次,外文中蕴含的讽刺意味。《围城》中的一些人物在进行对话时,或多或少地使用了外文,如妇女文章代表沈太太的“法文”,向方鸿渐介绍自己家瓷器的洋买办张吉民的“英文”等。

相比而言,在《儒林外史》中,歇后语的讽刺运用给文章增加了不少趣味性。经过统计,《儒林外史》中,歇后语使用的次数有二十多条次,每一条歇后语都能照应当时情境,符合人物当时心理表现,这与作品的风格相得益彰。如在第二回中,金有余差一个记账的人,于是让周进同他一路,此时周进心里想:“瘫子掉在井里——捞起也是坐”;在第三回当中,范进没有盘缠去乡试,于是同丈人商议,可胡屠夫骂范进不要以为自己中了相公,便可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有诸如“过了庙不下雨——忘恩负义”、“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等,通过这样诙谐、幽默的语言,不仅让读者增加了对文章的印象,而且还增强了讽刺效果。

其实在《儒林外史》和《围城》当中,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描写的方法当然还有更多,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得知,语言自身的讽刺意味常常就是它的各种不统一。

5 结语

鲁迅曾经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6]218}记得在法国的百科全书当中,关于“中国小说”这一块,尤其是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极高,说《儒林外史》是极其优秀的一部讽刺小说。通过多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吴敬梓在写《儒林外史》时,是站在他那个时代他所能企及的高度,然用自己的笔触表达了自己对世事人生的看法。而钱钟书则继承传统,贯通中西,充分利用文明成果,以新的生活态度深入研究人性,特别是腐朽的知识分子和现代文明中人类生存的困境,用怪诞的笔调讽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在东西文明、新旧文化的大碰撞下所显现的畸形社会。由于时代的不同,使得《围城》比《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更加深刻,讽刺对象和讽刺手法上都有较大突破。两部书所呈现出的不同的讽刺效果所达成的成就,一起厚实和发展了中国的讽刺文学,对中国讽刺文学的成长都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

(下转第 67 页)

同时,最大程度传达中式菜肴所赋予的深刻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 [1] 韦努蒂·劳伦斯.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C].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56.
- [2] J.c. Catfo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3] 中山时子. 中国饮食文化·宗教与饮食文化[M]. 徐建新,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21-21.
- [4] DWIGHT B. 语言要略[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1993: 370.

- [5] PETER N.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06.
- [6] 程迎春. 中式文化菜名英译研究[J]. 海外英语, 2016(12): 101-102.
- [7] 朱丽. 中国菜名的特点与可译性实践[J]. 宁波大学学报, 2011(4): 64-67.

(责任编辑: 周金萍)

(上接第 63 页)

参考文献:

- [1]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刘绍铭, 等译. 香港: 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9: 380-385.
- [2] 鲁迅. 鲁迅全集·卷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79.
- [3] 吴敬梓. 儒林外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97.
- [4] 鲁迅. 鲁迅全集·卷一[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193.

- [5] 李汉秋. 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99.
- [6] 鲁迅. 鲁迅论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218.

(责任编辑: 穆士虎)